



清华科史哲丛书

媒介史强纲领

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

胡翌霖 著



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清华科史哲丛书

媒介史强纲领

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

胡翌霖 著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9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史强纲领: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胡翌霖
著.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9

(清华科史哲丛书)

ISBN 978-7-100-17112-0

I. ①媒… II. ①胡… III. ①传播媒介—环境科
学—哲学 IV. ①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34746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清华科史哲丛书

媒介史强纲领

——媒介环境学的哲学解读

胡翌霖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艺辉伊航图文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7112-0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9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9%

定价:46.00 元

总 序

科学技术史(简称科技史)与科学技术哲学(简称科技哲学)是两个有着内在亲缘关系的领域,均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都在20世纪发展成为独立的学科。在以科学技术为对象的诸多人文研究和社会研究中,它们担负着学术核心的作用。“科史哲”是对它们的合称。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说得好:“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于2017年5月成立,将科技史与科技哲学均纳入自己的学术研究范围。科史哲联体发展,将成为清华科学史系的一大特色。

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学科属于理学一级学科,与国际上通常将科技史列为历史学科的情况不太一样。由于特定的历史原因,中国科技史学科的主要研究力量集中在中国古代科技史,而研究队伍又主要集中在中国科学院下属的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制订学科目录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将科技史列为理学学科。这种学科归属还反映了学科发展阶段的整体滞后。从国际科技史学科的发展历史看,科技史经历了一个由“分科史”向“综合史”、由理学性质向史学性质、由“科学家的科学史”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的转变。西方发达国家大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完成了这种转变,出现了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而直到20世纪

末,我国科技史界提出了学科再建制的口号,才把上述“转变”提上日程。在外部制度建设方面,再建制的任务主要是将学科阵地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向其他机构特别是高等院校扩展,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建立科学史系和科技史学科点。在内部制度建设方面,再建制的任务是由分科史走向综合史,由学科内史走向思想史与社会史,由中国古代科技史走向世界科技史特别是西方科技史。

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面临的是另一些问题。作为哲学二级学科的“科技哲学”过去叫“自然辩证法”,但从目前实际涵盖的研究领域来看,它既不能等同于“科学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也无法等同于“科学哲学和技术哲学”(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of Technology)。事实上,它包罗了各种以“科学技术”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是一个学科群、问题域。科技哲学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广阔无边的问题域中建立学科规范和学术水准。

本丛书将主要收录清华师生在西方科技史、中国科技史、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科学传播学与科学博物馆学五大领域的研究性专著。我们希望本丛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推进中国科技史和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也希望学界同行和读者不吝赐教,帮助我们出好这套丛书。

吴国盛

2018年12月于清华新斋

自序

本书由我 2014 年在北京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改写而成，该文由吴国盛老师指导，当年获得了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的荣誉。

当然，博士论文评为优秀，我是有些惭愧的，这篇论文有许多缺陷。最大的缺陷不是内容上的，而是体例上的。我的博士论文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偏重哲学，而第二部分则是若干重要人物的研究，这两部分当然是有所呼应的，但粗看起来多少会有前后脱节的感觉。而在挨个讨论这些大人物时，我的行文也受了许多束缚。

哲学其实是一个“自说自话”的事情，当引用他人的言论时，大哲学家往往也是“六经注我”，最终都指向个人观点的表达。但对于哲学学生而非大哲学家来说，我们尚没有资格或功力去驾驭他人的思想，往往做不到“借他人之口言说”，只能“替他人言说”。由于我论文中的“他人”有好几个，我在串联这些资源的同时，很难不被掣肘。但我不甘愿只作为他人思想的研究者，而仍然要借助这些资源阐发我自己的想法，这或多或少是有些托大的。因此，整部论文可能显得不那么流畅，而是呈现出某些缠绕和碎片化的结构。这种写法未必全是坏事，它会让文章拥有更多解释余地和回旋空间，但对于学位论文的评审老师而言却是痛苦之源了。也多亏评审老师们善良且惜才，没有因为写法而刁难我。

我曾计划以《技艺与记忆》为题,全面改写博士论文,减少“媒介环境学”诸人物的篇幅,改以我自己的论述为主。但后来发现改写的工程浩大,倒不如另起炉灶。至今这部《技艺与记忆》仍在谋划之中,尚未成型。

虽然动了推倒重写的心思,但并不意味着我放弃了博士论文中的任何观点,我相信我的工作仍是有价值的。即便是后半部分对媒介环境学派若干名家的梳理,我相信对国内学界而言仍有一定的意义。在我博士毕业之后,这几年来在国内又新出了不少对媒介环境学派的优秀译介,但我相信我的工作仍能为这一领域添砖加瓦。更重要的是,虽然我也欢迎传播学或媒介研究领域的学者阅读和批评,但我的这部作品首先是写给技术哲学领域的同行看的。而至今国内的科技哲学学者对媒介环境学派的关注仍是比较欠缺的。

因此,我很乐意先把这部不太成熟的作品修订出版,与国内同行分享,以求抛砖引玉。修订的幅度并不大,主要是在一些环节处理得更流畅一些。

由于改动不大,我仍然以博士论文的标题作为书名,但《技艺与记忆》这个尚未用上的书名仍然能够暗示出我这本书的真正主题。本书表面上看,是试图在媒介环境学与技术哲学之间架设桥梁,把媒介环境学派的学术资源引入技术哲学领域。而实质上,我是试图在物质与精神、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观之间架设桥梁。

目 录

第一章	对媒介环境学的重新定位	1
一	成为传播学的第三学派是好事吗?	1
二	传播学学派还是史学纲领?	5
三	历史与哲学的双重纲领	6
四	“环境”还是“生态”?	11
第二章	媒介存在论	17
一	存在论就是媒介论	17
二	媒介即讯息	19
三	媒介是“人的延伸”	22
四	媒介的发现	25
五	将媒介作为媒介反思	26
六	从日常生活世界出发	31
七	媒介先于媒介的对象	35
八	“介入”	37
九	人的媒介性	41
十	媒介是一面镜子	45
第三章	媒介史作为先验哲学	49
一	“……作为……”	49

二	美诺诘难	53
三	康德重提先验哲学	55
四	三重综合	60
五	滞留的循环	63
六	遗忘与媒介	66
七	历史的轮回	70
第四章	提出一种媒介史的强纲领	73
一	媒介决定论	73
二	原则一:因果性	77
三	原则二:公正性	81
四	原则三:对称性	84
五	原则四:反身性	85
六	第零原则:实践性	89
第五章	技术与文明史——芒福德的视野	97
一	技术史作为人的历史	97
二	从技术史中激活文明的可能性	104
三	有机的技术	109
四	城市与历史	114
五	媒介环境学的先驱	123
第六章	媒介的经济史——英尼斯的“偏见”	126
一	媒介史的开辟者	126
二	从交通到交流:经济史到传播史	128
三	偏见:历史和历史学	133
四	正反合:历史的循环	139

五	纸的历史·····	144
第七章	媒介的自然史——麦克卢汉的方法·····	152
一	文学风格还是研究方法? ·····	152
二	“自然—史”的四重内涵·····	155
三	媒介作为环境·····	157
四	界面的方法·····	165
五	历史的动因·····	171
六	存在论的追思·····	187
第八章	媒介的革命史——爱森斯坦的实践·····	194
一	范式就是共同体的媒介环境·····	194
二	媒介史中的范式革命:口语—书写—印刷 ·····	202
三	自然观、史学与科学方法 ·····	210
四	从史学的兴趣出发关注自然·····	217
五	自然成为标准的原版·····	223
六	自然成为公开的知识·····	227
七	媒介环境学的实践·····	230
第九章	媒介的教育史——波斯曼的立场·····	232
一	媒介的说教家·····	232
二	认识论:二元对立和本质主义 ·····	238
三	印刷术:童年的历史 ·····	243
四	电视:视觉还是触觉? ·····	249
五	电视:疯癫还是生活 ·····	260
六	历史与教育·····	265

第十章 媒介的进化史——莱文森的批评·····	268
一 对悲观论者的批评·····	268
二 谁选择技术? ·····	272
三 如何选择技术? ·····	275
四 用什么评估技术? ·····	279
五 技术的生灭·····	283
六 玩具—镜子—艺术·····	286
第十一章 反身考察——本书的媒介环境·····	289
一 反身性的自我应用·····	289
二 网络时代·····	290
三 汉语写作·····	293
四 书籍与专著·····	295
五 论文与期刊·····	298
六 书写到“字处理”·····	300
七 大学与口语传统·····	305

第一章 对媒介环境学的重新定位

一 成为传播学的第三学派是好事吗？

“媒介环境学”(media ecology)20 世纪后半叶在北美兴起。它奠基于以英尼斯(Harold Innis, 1894—1952)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11—1980)为代表人物的多伦多学派。1970 年,波斯曼(Neil Postman, 1931—2003)在纽约大学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博士点,形成了纽约学派的学术据点。1998 年,以纽约学派为中心创建了“媒介环境学学会”(Media Ecology Association)。

本书试图从哲学,特别是技术哲学的背景出发,探讨媒介环境学的定位、范式和意义。本书的任务不仅在于归纳和转述相关学者的思想和论点,而且还要把它当作一门方法或学科,作为整体进行梳理、评价和吸收。

按照媒介环境学学会副主席林文刚所言,“媒介环境学”这个概念在创立三十余年后仍然默默无闻,“这个研究领域仍然处在传播学研究的边缘地带”^①。而传播学研究的传统一般被认为有两

^① [美]林文刚:“绪论: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沿革初探”,载[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何道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3 页。

派,即管理(或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①,前者关注媒介的内容和效果,后者关注媒介的控制和所有权。而按照何道宽等国内学者所说,媒介环境学试图“三分天下”“成为继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之后的第三大学派”。^②

这一努力似乎取得了成效。何道宽提到:“到了世纪之交,媒介环境学会(MEA)终于打进北美传播学的主流圈子。学会的发展过程留下了三个显著的地标:1999年成为美国传播学会(NCA)的分会,2002年成为美国东部传播学会的分会,2003年成为国际传播学会的团体会员。”^③

但这一定位是有问题的。虽然媒介环境学号称具有跨学科的多维视野,但实际进行解读时,往往只是被定位于传播学之内。事实上,即便媒介环境学真能发扬光大,与传播学中的另两个学派鼎足而立,也并不见得就达到了最恰当的位置。关键在于,媒介环境学并不仅仅是以媒介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一个专门学科,“媒介”不如说是思考的出发点,而其真正关注的领域远远超出了传播学的范畴。

按照媒介环境学的“官方”定义,媒介环境学指的是“对媒介环境(media environments)的研究,其观点是技术和技艺、信息模式

① [美]林文刚:“绪论:媒介环境学的思想沿革初探”,载[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第3页。

② 何道宽:“何道宽中文版序”,载[美]林文刚编:《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序第2页。

③ 何道宽:“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

和传播编码在人类事务中扮演着主导角色”^①。

我们首先可以注意到,除了“信息”和“传播”,媒介环境学也关心一般的“技术和技艺”,以麦克卢汉为代表,媒介环境学家普遍持“泛媒介论”——“媒介”的范畴不仅包括报纸、电话、电视等,更包括语言、文字、道路、服饰、城市、时钟等。如果说人类的存在总是“寓于技术”的“共在”(海德格尔的语言),那么所有人类生存于其间的技术环境都可以算作“媒介”。

无论如何,媒介环境学的“媒介”概念远远超出一般传播学的范畴,甚至比一般的技术定义还要宽泛。

其次,媒介环境学的基本命题是“媒介即环境”或“环境即媒介”,媒介是人类生活于其中进行感知、理解和行动的背景。同时,人类之所以有可能感知、理解和行动,也是因为人们总是处在文化之中,因此也就是处在某个技术环境之下。

为了说明“媒介”的意思,波斯曼举例说:“在皮氏培养皿那里……所谓媒介的定义就是培养皿中的一种物质(substance),能够使培养的微生物生长的一种物质。如果你用技术(technology)这个词来取代这种物质,这个定义就能够成为媒介环境学的一个基本原理:媒介是文化能够在其中生长的技术。”^②也就是说,媒介就是“作为文化之环境的技术”。

① Lance Strate, “Understanding MEA,” *In Medias Res*, Vol. 1, No. 1, 1999. 在媒介环境学学会官网上引用, 见 http://www.media-ecology.org/media_ecology/index.html (2018年1月9日浏览)。

② [美] 尼尔·波斯曼: “媒介环境学的人文关怀”, 载 [美] 林文刚编: 《媒介环境学: 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 第44页。

因此,与其说媒介环境学关注的是媒介问题,不如说在“技术环境”之内的“人类事务”或“文化的生长”才是它真正的关切。

作为多伦多大学的文学教授,麦克卢汉后来的据点是“文化与技术研究所”,而波斯曼创立媒介环境学专业之前隶属教育学院。至于其他先驱或代表人物,英尼斯的领域首先是经济史,芒福德(Lewis Mumford, 1895—1990)是以城市史著称的通才作家,法国学者埃吕尔(Jacques Ellul, 1921—1994)以社会理论家和神学家著名,哈夫洛克(Eric Havelock, 1903—1988)是古典学家,翁(Walter Ong, 1912—2003)以研究中世纪文学史起家,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 1923—)是法国史专家……

总之,除了在媒介环境学建制化之后被波斯曼等培养出来的第三四代人物外,媒介环境学领域的几乎所有著名人物都不属于“传播学”的学科范式之下,也从不以“传播学家”著称。

既然如此,为何羽翼丰满后的媒介环境学,偏要投入传播学的怀抱呢?在包括部分媒介环境学家在内的学者看来,媒介环境学原本就属于传播学,只是因为主流传播学家的忽视和偏见而曾经游离于外。因此,羽翼丰满之后,理应被吸纳回去。

但在我看来,“成为传播学的主流学派之一”对于媒介环境学派而言,不是拔高,而是贬低。关键是,媒介环境学原本就不属于,也不应归入传播学的名下。

当然,麦克卢汉等人的思想对传播学界造成了巨大的影响。但他们的思想对其他学术领域也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这并不证明媒介环境学就一定要借势杀入传播学之内占山为王。就好比说许多物理学家还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这并不意味着宗教应成为物

理学的一部分。

二 传播学学派还是史学纲领?

把媒介环境学归入传播学名下,恐怕是基于某种误会。这类似于把科学史这门学科归入理科名下。乍看挺顺理成章,但事实上,科学史虽然以科学活动为研究对象,本质上却应该属于历史学。即便由于背景知识和学科传统的独特性,科学史在建制上往往会独立于历史学,但就其学理定位而言,它理应属于历史学。

当然,学科建制的归属有其学术政治方面的机缘,例如在中国,科学史这门学科就阴差阳错地被归入理学一级学科,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并列。而具体到各院校来说,科学史领域的学者又经常栖身于哲学院、人文学院、社科学院等机构。这些建制上的隶属关系显然不总是符合学理逻辑上的从属关系。学者们不得不屈从或利用现实的学界版图,但在学理讨论时却不该受限于此。

波斯曼在纽约大学设立媒介环境学研究计划,最后争取到了“文化与传播系”(Department of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系主任的位置,成为媒介环境学建制化的里程碑,但后人不应把好不容易争取到的学术资源变成束缚自己的枷锁。波斯曼可以隶属传播系,但媒介环境学不必隶属于任何系。

本书愿意提出一个与众不同的观点,与其把媒介环境学归入传播学,不如把它归入历史学。本书希望为它在史学领域确定一个更恰当的定位。

这也不是说媒介环境学应当成为历史学下的一个分支部门,

比如说历史学下有技术史,技术史下再有媒介史,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想说,媒介环境学不是为历史学提供了一个新的领域,而是提供了一条新的纲领。

好比说,我们有思想史、社会史等不同的编史风格,有计量史学、年鉴学派等不同的编史学流派,而媒介环境学也能成为“一种技术史”乃至“一种历史”。这种历史学秉持某种特别的技术哲学观念,从而把一般的人类文明史叙述为技术史,把技术史叙述为媒介史。简单来说,就是一种从媒介出发梳理历史的编史纲领。

这种意义上的媒介史并不是把媒介当作研究的“内容”或“对象”,而是把媒介当作研究的“环境”,亦即背景、语境、方法等。

我们可以特别注意到,那些被媒介环境学追认的著名学者几乎无一以传播学家著称,但又无一不是以历史学家著称。从芒福德的《技术与文明》到哈夫洛克的希腊哲学史,从英尼斯的《帝国与传播》到莱文森(Paul Levinson, 1947—)的“信息革命的自然史与未来”^①,不仅都是在做历史,而且都限于媒介的发明史,而是着眼于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等广阔的历史视野。

三 历史与哲学的双重纲领

历史材料浩如烟海,而编史显然并不是随机去拾取材料然后罗列起来。究竟哪些材料更重要,哪些可以忽略,哪些材料之间有某种线索串联起来,这就需要有特定的编史学方法。

① [美]保罗·莱文森:《软利器》,何道宽译,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